

中国

抗日战争史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伪政权
与沦陷区

〔第七卷〕

臧运祜 王希亮 著

步平 王建朗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出版社官方微信
www.ssap.com.cn



定价: 1580.00 元 (全八卷)



步平 王建朗 主编

中国抗日战争史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第七卷

伪政权与沦陷区

臧运祜 王希亮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各伪政权的建立	007
第一节 从伪满洲国到伪满洲帝国	008
第二节 七七事变以前日本在华北成立的伪政权	032
第三节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华北、华中扶植的伪政权	048
第四节 “汪精卫工作”与汪伪国民政府的建立	062
第二章 各伪政权的政治形态与相互关系	083
第一节 伪满洲国的政治与“外交”	083
第二节 汪伪政权的政治与“外交”	123
第三节 汪伪政权与华北伪政权、伪蒙疆政权的关系	143
第三章 沦陷区的军事	151
第一节 伪满洲国	151
第二节 华北伪政权、伪蒙疆政权	162
第三节 汪伪政权	170
第四节 日伪在沦陷区的军事镇压活动	185
第四章 沦陷区的经济	204
第一节 日本对东北地区的经济统制及其资源掠夺	204
第二节 华北沦陷区	230
第三节 华中沦陷区	248

第五章 沦陷区的社会组织与文化	267
第一节 协和会、新民会、大民会	267
第二节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	314
第三节 沦陷区文学	328
第六章 沦陷区的教育	340
第一节 东北沦陷区	340
第二节 华北沦陷区	357
第三节 华中沦陷区	366
第四节 沦陷区的留日教育	380
第七章 沦陷区民众的抗争与伪政权的崩溃	396
第一节 东北社会各界的反日斗争	396
第二节 关内沦陷区民众的抗争	409
第三节 伪满洲国的崩溃	422
第四节 关内各伪政权的崩溃	430
第五节 战后对于汉奸、伪军的处理	434
主要参考文献	448
人名索引	461

前言

一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伪政权与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并实施殖民统治的必然产物。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由此开始了从局部到全面、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日军侵占中国的领土之后，为达到亡华、灭华之目的，转而实行“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关内外广袤的占领地区，组建了一系列在日军刺刀之下的傀儡政权，以继续实行其对于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这些在日伪统治之下的广大地区，从抗战时期以来就被称为中国的“沦陷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侵占东北三省全境及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1932年3月扶植成立了以逊清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1933年初侵占热河省与长城以北地区后，又将该地区划入了伪满的界内。东北沦陷区在日伪统治之下的时间长达14年之久。

1933年元旦始，日军开始了向中国华北地区的扩张。根据《塘沽协定》^①而形成的冀东“非武装区”，成为日本向关内扩张的基地。1935年，日军发动“华北事变”，策划华北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自治运动”，企图将上述地区分离于中国本土之外。1935年底，成立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

^① 按，由于伪政权为本书论述的主要对象，由其颁布的法令条规，以及在全国抗战爆发前日军迫签而在中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予以废除的各类协议等，为便于行文，均以书名号标注。

政权，1936年5月，成立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日本将中国传统上的“华北地区”，^①别有用心地一分为二，分别由中国驻屯军（简称“天津军”）和关东军主持，进行旨在分裂华北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日本从华北开始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华北方面军侵占华北各地区之后，在北平、天津“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后被改称“北京”）扶植成立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②1938年1月1日就职。该伪政权后来下辖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特别市，即形成本书所谓“华北沦陷区”之主体。

关东军侵占察哈尔、晋北、绥远等地的同时，于1937年9月4日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10月15日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月28日在归绥（后被改称“厚和”）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1月22日，上述三个“自治政府”在张家口组建“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改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对于伪蒙疆政权下辖的内蒙古西部沦陷区，本书为了叙述方便并考虑到传统见解，有时单独列论，有时又与华北沦陷区、关内地区一并论述。

日本华中方面军侵占上海、南京等地区之后，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扶植成立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其辖区主要是今江苏、浙江与安徽等省以及上海市。后随日军对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占领，又逐渐扩大到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经过日本方面的统合与协调，伪华北、华中两政府均同意组建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而华北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汪伪政权继承了伪维新政府的基础，其辖区随着日军的侵华行动亦有所增加，但本书一般仍称其为“华中沦陷区”，有时也与关内地区一并列论。

① 据有关学者考证，“华北”一词，是19世纪末期在外国势力逐渐深入中国和国人注意维护主权的语境下形成的，1920年代以后其使用频率很高。张利民：《“华北”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关于1930年代的“华北”概念问题，参见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5页。

② 为行文方便，本书提及的伪政权设立的相关机构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标引号，下文再次出现时则不一一标注。

综上，本书所称之“伪政权”即为抗战时期的伪满洲国、华北伪政权、伪蒙疆政权与汪伪政府，“沦陷区”则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涵盖东北、华北（含内蒙古西部地区）、华中（含上海、南京、华南）^①地区或称关内外地区的、由日军占领而通过伪政权实施殖民统治的中国地区。

二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当时中国最为富庶而被日伪政权统治下的广大沦陷区的历史，自然应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早在全国抗战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关注到了沦陷区的重要性及其研究的意义。为了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问题，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研究讨论之外，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分为四个问题，“沦陷区问题”即为其中之一。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解放社即将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专门撰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论述了沦陷区问题的意义及其研究的重要性与方法问题。^②尽管如此，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之下，包括解放区在内的中国大后方，虽然出于抗战的需要收集、编印了大量的日伪情报与沦陷区的各种资料，^③但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在抗战时期还难以开展。战后通过接收敌伪产业与审判汉奸，积累了一些日伪资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伪政权和沦陷区的研究历经曲折，但后来居上，终于走上了繁荣与发展之路。1980年代以来的20年间，则是大步迈进和走向繁荣阶段：在这些成果中，既论及日本殖民统治问题，又论述了各伪政权的成立与汉奸集团及其重要人物，还涉及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民众抗争的方方面面。并在伪满洲国与东北沦陷区、汪伪政权与华中沦陷区这两个主要方面，已经

① 关于“华东、华中”，是按现今中国方面的地理概念进行区分的，也就是说具体到长三角一带就叫“华东”，而具体到武汉一带，就叫“华中”。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不同语境下，华中、华东所指范围有所不同，为行文混乱，本书除特别提及之外，“华中”即包括现今所指的华中、华东地区。

②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1—3页。

③ 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特种经济调查处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等部门，在抗战时期也编辑过一些有关沦陷区的资料。

取得了大量而重要的研究成果。^① 21 世纪以来,一方面继续提高沦陷区研究水平,特别是细化资料、深化内容、提高理论、推进整体;^② 另一方面,针对一直处于薄弱甚至空白状态的华北伪政权、伪蒙疆政权以及华北(含内蒙古)沦陷区,大力加强了研究。关于华北沦陷区及其伪政权,除了相关资料的大量刊布之外,近年问世的四部专著,^③ 代表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④ 关于伪蒙疆政权的研究,近年问世的四部专著^⑤以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发表的一组专题研究论文,表明抗战时期伪蒙疆政权史是一个方兴未艾,值得奋发有为的领域。^⑥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台湾地区,对于汪伪政权史的研究始于 1980 年代。吴学诚的硕士学位论文《汪伪政权与日本关系之研究》(1980)之后,又有邵铭煌的博士学位论文《汪伪政权之建立与兴亡》(1990)。此外,还有陈鹏仁、陈木杉编辑的有关资料以及关于汪精卫“和平运动”与其他人物的一些研究成果。^⑦ 近年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克文关于汪精卫及其政权的研究,^⑧ 刘熙明关于伪军与强权政治之关系的研究,^⑨ 罗久蓉关于“汉

① 参见金光耀、张济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研究介绍》,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 299—322 页;余子道:《回眸与展望:建国以来的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② 2010 年 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哈尔滨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的学术讨论会,相关中青年学者就深化沦陷区研究发表了意见。其笔谈文章,收入《抗日战争研究》2010 年第 1 期。

③ 郭贵儒等:《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刘敬忠:《华北日伪政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三联书店,2012);郭贵儒:《河北沦陷区伪政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

④ 相关情况,还可参见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⑤ 祁建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察绥地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金海:《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日本在内蒙古殖民统治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任其铎:《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⑥ 臧运祜:《关于抗战时期伪蒙疆政权史的研究(代序)》,《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5 期。

⑦ 邵铭煌:《台湾地区汪精卫政权史料与研究》,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台北,“国史馆”,1997,第 1833—1853 页。

⑧ 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台北,“国史馆”,2001。

⑨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

奸”审判问题的研究。^① 巫仁恕关于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的研究。^②

二战后的日本学界，对于伪满洲国的研究，自1970年代以后开始活跃，成果可谓丰硕，但观点也有争论。^③ 对于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在沦陷区诸伪政权研究中较有代表性。其研究有如下特点：一是在研究范畴上，对于伪政权的研究多置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对占领区的研究则置于日本史或殖民统治的范畴，且后者的研究成果明显超过前者；二是在研究方向上，经济面胜于政治面，对于占领地经济支配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三是在研究态度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批判胜于辩护，对于汪伪政权则同情多于斥责。^④

欧美学界早在1970年代就有学者探讨战时傀儡政权的问题，^⑤ 1980年代，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开展，对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问题开始进行研究，1990年代以后对于沦陷区的傀儡政权之研究也开始兴盛。在普遍肯定“沦陷区研究”的潜力与价值的基础上，其成果分为两类：一是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偏重社会史和文化史；二是沦陷区的傀儡政权，倾向于政治史或外交史，后者又不可避免地涉及抗战时期的所谓“和平运动”。^⑥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研究了中国抗战初期江南五城在沦陷之后的社会秩序问题。^⑦

三

本书在主编步平先生的指导之下，由臧运祜、王希亮共同撰稿。臧运祜负担了全书的设计、规划与后期统稿工作。具体写作分工如下：

王希亮撰写关于伪满洲国及东北沦陷区的所有部分。臧运祜负责关内

① 罗久蓉：《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② 巫仁恕：《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7。

③ 山根幸夫ほか編『〈増補〉近代日中関係史研究入門』研文出版、1997、229—275、497—503頁。

④ 许育铭：《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⑤ 〔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初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下册），陈体芳、乐刻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

⑥ 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⑦ 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

各伪政权及沦陷区的部分，并撰写第一章后三节、第二章后两节、第五章第二节第二目、第七章第二节及第四节。徐志民撰写第六章第四节。汪朝光为第七章第五节提供初稿，臧运祜进行修改。

赵秀宁、张展、刘洁、吴文浩，分别为第三章第二节与第四节第二目及第四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三节与第四节第三目及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二目与第三目、第五章第三节第二目及第六章第二节与第三节，提供了初稿，最后由臧运祜进行了全面加工与统一改定。

由于作者的学识有限，本书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期待各位方家与同仁的批评与指教！

第一章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各伪政权的建立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由此开始了从局部到全面、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日军侵占中国的领土之后，为达到灭华、亡华之目的，转而实行了不同于台湾殖民统治的“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政策：在中国关内外的广袤的占领地区，扶植中华民族的各色汉奸与败类，组建了一系列在日军刺刀之下的傀儡政权，以继续实行其对于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侵占东北三省全境及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1932年3月扶植成立了以逊清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1933年初侵占热河省与长城以北地区后，日军又将该地区划入了伪满的界内。在日本操纵下，1934年3月1日，溥仪称帝，改年号为“康德”，从此变为伪满帝国。而根据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而形成的中国冀东的“非武装区”，则成为日本向关内扩张的基地。

1935年初开始，日军发动“华北事变”，策划华北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自治运动”，企图将上述地区分离于中国本土之外。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后，1935年11—12月间，日军扶植成立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1936年5月扶植成立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日本由“天津军”和关东军分别主持进行的上述“工作”，旨在仿效伪满而分裂华北与内蒙古西部地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扩大，在中国关内的广大占领区，继续扶植建立一系列伪政权。华北方面军在北平、天津“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后被改称“北京”）扶植成立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1月1日该伪政府就职。关东军进占察哈尔、晋北、绥远等地的同时，于1937年9月4日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10月15日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

月28日在归绥（后被改称“厚和”）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1月22日，上述三个“自治政府”在张家口组建“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改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华中方面军侵占上海、南京及华东地区之后，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扶植成立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其辖区主要是今江苏、浙江与安徽等省以及上海市，后随日军对于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占领，又逐渐扩大到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

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经过日本方面的统合与协调，上述伪华北、华中两政府均同意组建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而华北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蒙疆政权亦继续维持其特殊存在。日本政府直到11月30日才对汪伪政权予以承认。

本章以下将大致按照时间和地区，分别论述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各伪政权的建立过程。

第一节 从伪满洲国到伪满洲帝国

一 从伪满洲国到伪满洲帝国

1. 伪满洲国实施帝制

1929年，张学良继承父业后励精图治，不仅拒绝了日本对满洲权益贪得无厌的索取，而且顶住了日本的压力并排除其阻拦，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并且加紧“满铁平行线”的修筑，加快葫芦岛港湾建设，另在体制改革、政权建设，以及民生、教育等方面也有许多建树，这使得日本人分外恼火。1930年10月，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提交了《关于我国在满蒙权益的意义》，内称：“我在满蒙的权益除物资、经济上的利益外，还包括日本同满蒙的唇齿相依关系，换言之，对我国生存具有重大关系，因此，必须对满蒙予以深刻关注。更重要的是政治利益，从某种意义说，也是我国对支那全土利益之所在。”^①几个月后的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抛出“生命线论”，他在第59次帝国议会上宣称：“满蒙问题关系

^① 「満蒙に於ける我“權益”の意義に就て」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2030036300。

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他主张外交方针应该致力于“如何使国家的经济获得发展，徒然发出高亢的声音，引起外国的注意，是不能实现有益的目的”。^①他明确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此后不久，松冈又在一篇文章中着重强调这一观点，必须“立足于我国生命线这一点之上，确保和死守满蒙，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个人”。^②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官方抛出的“满蒙生命线论”，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军政当局急欲侵吞中国东北的罪恶心理。

1931年4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的主持下，召集欧美课长、中国课长以及中国班长、俄国班长等要员开始了侵吞中国东北的具体策划，制定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要点的《形势判断》。《判断》提出要分三个步骤解决满蒙问题。第一步是建立取代张学良的亲日政权；第二步是把亲日政权从中国的主权下分离出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第三步是实现满蒙的全面占有。该文件成文后经陆军三长官会议通过，并呈报天皇批准，然后向各部队做了传达。

1931年6月，经陆相南次郎大将批准，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成立了解决满蒙问题秘密委员会，委员长由建川美次担当，成员有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补任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因此又称“五课长会议”，后来又增添作战课长今村均、编制课长东条英机，以及矶谷廉介等三人参加，故称“八课长会议”。6月19日，经“八课长会议”拿出一个《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该大纲计有八条，其主要内容有：

- (1) “如排日行动仍有发展之势，则应预作最后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之准备”；
- (2) “解决满洲问题，极需取得国内外之理解。陆相应通过阁议努力使各大臣了解当地之现状”；
- (3) “对全国国民，尤其对新闻界应使之了解满洲实况”；
- (4) “军事行动所需兵力，由作战部与关东军协商制订计划”；
- (5) “为取得国内外谅解采取之措施，应以大约一年为期，即明春以

① 「第59回帝国議会衆議院議事速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7050025300。

② 步平等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88、89页。

前务期周密实施之”。^①

可以说，该大纲是日本军事当局决定以军事手段侵吞中国东北的纲领性文件，只是在时间设计上考虑到需要取得各方面的“理解”或“谅解”，以一年为期，比关东军实际发动事变的时间推迟了半年多。

在东北，关东军也预先策划了一系列侵吞及统治东北的方案。事变前，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曾拟订《关东军领有满蒙的计划》，设想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后实施与台湾、朝鲜等地相同的统治体系，即由日本的军、政机关实行直接统治。事变爆发后的9月20日，受命到东北“约束”关东军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对未来的统治方式提出建议：“应推翻东北现政权，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盟主的政权。”^②9月22日，在关东军高级军官会议上，与会者拟定了《解决满蒙问题策案》，主张“建立受日本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帝为首领的中国政权”；“新政权”的国防、外交、交通、通信等由日本掌管，经费由“新政权”负担；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于芷山、张景惠为地方镇守使。^③10月2日，关东军将《策案》改称《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其基本方针是“把满蒙作为独立国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国防委托给日本”，“铁路（通信）委托日本管理”。10月21日和10月24日，在《方案》的基础上，关东军相继出台《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及《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策》，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满蒙国家。这个国家与中国本土断绝一切关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其实权掌握在我方手中；以东北四省和内蒙古为其领域”。^④

以上关东军的主张基本得到日本军政各界的赞同和支持，经过上上下下的“磨合”及磋商，日本炮制伪满洲国的方案终于出台。1931年12月23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制定了《处理时局要纲草案》。其方针是，“在帝国军队的威力下，引导满蒙在本质上达到帝国保护国的状态；同时，使其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运输等关系上，体现帝国永远存立的要素

① [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185、186页。

② 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第7卷『満州事変』みすず書房、1964、187頁。

③ 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第7卷『満州事変』189頁。

④ 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第7卷『満州事変』232頁。

的作用”。^① 1932年1月6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出台《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其根本方针是，“对于满蒙，期望在帝国的威力下，使该地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信等各种关系上，体现出帝国永远存立的要素的作用”，“让纯正的帝国臣民，以顾问或其他形式参加整个中央和地方机构，以强化我国在满蒙的政治支配力量”，“满蒙的对外防卫主要由帝国担任”等。^② 同年3月12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该要纲。于是，清廷逊帝溥仪登上了历史舞台。

早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及清廷遗老遗少出宫肇始，日本就通过各种方式把溥仪“保护”起来，以为“奇货可居”，几年后果然派上了用场。已经成年的溥仪终日被一批复辟派缠绕，脑子里也充满了复辟大清的幻想。所以当土肥原设计将其从天津秘密护送到东北时，溥仪以为机会到来，对臣下“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甘休”。^③ 然而，日本人最终只是让他充任伪满洲国的执政。日本炮制伪满洲国不过是建立一个为宗主国服务的傀儡政权而已，绝非帮助溥仪复辟清室。1932年3月6日，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的威逼下，溥仪在日方起草的《溥仪致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密函》（日本称《溥仪·本庄书简》）上签了字。其主要内容有：“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司令官之同意”等。^④ 这便是后来所谓《日满议定书》的雏形，确立了伪国受控于日本宗主国操纵和驾驭的地位。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极不情愿地接受伪执政这一头衔，“还梦想着真正的‘黄袍加身’”。^⑤ 他身边的遗老遗少，如郑孝胥、熙洽、罗振玉等人也是竭力运动鼓噪，熙洽甚至组织一伙人在“新京”一座小学

① 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第7卷『滿州事変』320頁。

② 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第7卷『滿州事変』589頁。

③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5，第315页。

④ 小林龍夫等編『現代史資料』第7卷『滿州事変』408、409頁。

⑤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第148页。

礼堂举行实施帝制请愿大会。溥仪也派出亲信到日本活动，央求日方同意实施帝制。

到1933年，在关东军残酷的军事镇压和政治统治下，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逐渐稳定，为了更有效地驾驭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权贵，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出台《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又称“八八阁议”），内中除了规定全面操纵和控制伪满洲国的原则以及方针外，还明确规定：“满洲国以立宪君主制为最终目标，但目前仍维持现行体制，经慎重讨论后再制定正式宪法。”^①1933年12月19日，关东军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菱刈隆将日本政府同意“满洲国”实施帝制的决定通知溥仪。12月22日，日本内阁通过《关于满洲国准备实施君主制问题》，内中提出，“目前帝国就满洲国实施君主制问题将对满洲国进行指导，除由该国制定宪法及皇室令等之外，还应根据下列要点进行准备工作，一俟完成后，再实施君主制”，“（但）必须明确，实施君主制决非由君主亲信实行独裁的清朝的复辟，而是确立新兴满洲国之国体”，“帝国对满洲国之指导方针及要领仍一如既往，不能产生任何动摇”，“君主即位宣言应特别慎重，阐明满洲国君主制之意义以及日满两国不可分之关系”等。^②1934年3月1日，溥仪终于“如愿以偿”，举行了登基大典，宣布登上伪满皇帝的“宝座”，年号“康德”。但在即位讲话中却按照关东军的旨意明确宣布：“执政自建国以来，深体天意之所在，致力于顺天安民之仁政，以致内政外交政绩大举，与善邻日本之友好关系更加敦厚。在此时机，即皇帝位实现建国之理想……帝制为以皇帝为中心主义政治，与皇帝被亲信所包围的独裁政治清朝复辟，断然不同。”^③这段讲话无异于宣告溥仪复辟清室的“梦想”彻底破灭。

然而，伪国实施帝制毕竟给溥仪带来了虚荣和满足，尤其是不久后昭和天皇御弟秩父宫殿下专程来贺，以及溥仪东渡致谢，将“日满一体”、“日满亲善”的闹剧推向高潮。

1934年6月，秩父宫殿下专程前来道贺，在伪京受到溥仪一行的热情接待。秩父宫殿下特意带来昭和天皇的亲笔信，并赠送溥仪日本最高勋位的大勋位菊花大绶章，赠给皇后婉容一等宝冠勋章，对伪国实行帝制表示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第26页。

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傀儡政权》，第152、153页。

③ 『满洲国史』刊行会『满洲国史』総論、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1973、412頁。